

革命文物年代论

李晓东

革命文物是中国重要的革命文化遗存,它记录着中国革命斗争历程,见证着中国革命斗争历史,蕴涵着一代代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谱系,是不可再生的革命文化资源,是中国人民振兴中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巨大力量源泉。在革命文物中,其年代有着特别重要价值和作用,本文以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为例,对其年代、重要价值和作用作简要述论。

革命旧址、遗址的年代具有时代性

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以下均统称革命文物)的年代,有其显明的时代性,即时代特征。

其一,革命文物起始年代,有其特定的年代,即1840年,这是由特别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决定的。它与中国近代史开端同步,同时是中国近代文物起始年代。革命文物是近代以来文物即近现代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革命文物年代有显明的时代特征,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物年代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物年代,其时代特征明显不同,表现为不同时期革命文物对象、范畴、内涵等方面的区别或者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战文物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物,在对象、范畴、内涵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这些区别或者差异,应是近代以来不同年代或时期革命对象、任务、目标和采取、实行的路线等不同所决定的。

其三,每一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都有其特定的年代,没有年代的革命文物是不存在的,关键是如何科学认定或确定它的年代。同时,对某文物是否能认定为革命文物,或者说对该文物的政治属性的确定亦至关重要。

革命旧址、遗址年代与其本体建筑年代具有一致性

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一般都有建筑物或构筑物等作为其主体部分。对这一类革命文物来说,革命旧址、遗址等的年代,与其主体建筑等年代总体上是一致的。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某战役纪念碑、烈士纪念碑、纪念亭、烈士墓、烈士墓地、烈士陵园等。

也应指出,这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年代,其主体建筑年代,与其纪念的革命事迹、革命英烈等革命内容的年代,则具有非一致性。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1958年落成,因此,它的年代是1958年。而它纪念的是1840年以

来为反对西方列强和封建君主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斗争进程中的革命事迹和人民英雄。换言之,它纪念的是整个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英雄事迹。这一特点,是此类革命文物特性即纪念性所决定的。每一处总体上主旨一致,基本内容连通,逻辑结构严谨,构成一处完整的革命事迹。

还须指出,还有一类革命旧址、遗址如重大专项科研基地与工程建设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年代,与其主体建筑物或构筑物及相关遗存的年代具有一致性。如大庆第一口油井(1959)、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旧址(1957—1995)。

革命旧址、遗址年代与其主要建筑年代具有非一致性

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其中如重大历史事件、重要革命活动、重要战役、重要会议等旧址、遗址,大都由其主要建筑物等构成。这些革命旧址、遗址的年代,与其构成的主要建筑物并非有一致性。从革命旧址、遗址构成的范围、主要建筑物来看,有皇家建筑、豪宅宅邸、商旅建筑、农舍建筑、寺庙建筑等。这些建筑物的年代与其确定的革命旧址、遗址并非一致。这些革命旧址、遗址等起始年代,是由重大革命事件、重要革命活动、重要战役、重要会议的起始年代为其起始年代,或重要党政军等机构某年某月入驻为起始年代,都是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与此同时,赋予了它新的功能、内涵和属性。这是由革命进程中斗争和工作需要所决定的。这种年代上的非一致性,是这类革命旧址、遗址等的重要特征之一。

同时,在确定了一处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起始年代,其范围内的主要建筑物作为该革命文物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该处革命文物年代对待。换言之,这些建筑物原来的功用已经终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革命旧址、遗址新的功用同时开启,新的,革命的历史一页已经展开,从此书写新的历史。这是其重要特征。

应特别注意,这并不是改变这些建筑物原有年代。在记述革命旧址、遗址等的历史与现状时,

需要追述该建筑物的年代和功用。例如,北京天安门,原为皇宫建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天安门是这一重大历史性时刻所在地,是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见证,同时,也开启了天安门历史新的一页。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天安门列在“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类。这一认定,就是明证。这一类革命旧址、遗址的演变、发展史迹大都如此。这样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其发展变化,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这种革命旧址、遗址年代方面的非一致性,从多角度、多层次进一步加深研究,呈现立体化的阐释,会极大地增加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历史厚度与学术深度。

革命旧址、遗址认定中年代的关键性

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认定中,年代问题至关重要。近代文物中,许多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能否认定为革命文物,应以近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和历史事实为依据,从不同时期革命对象、任务、目标和路线等方面进行研究,认定其是革命文物,还是罪证史迹。换言之,认定其是革命文物,还是近代文物,也就是说,作为近代史迹,是近代文物范畴,但不是近代文物中的革命文物,这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年代为1926年至1927年。届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武汉国民政府代表了革命一方,其旧址应认定为革命旧址。据“简介汇编”: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后,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抵达武汉,组成“临时联席会议”。1927年3月,在此召开了有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等参加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组成国共联合政府。

但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之后,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已成为反动政府,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一直对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国共重庆谈判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

民政府还都南京。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旧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证史迹,只可作为近代文物,应是历史的判定。

从以上可以清楚看出,旧址、遗址定名和年代的重要性,两者密切相连。进而言之,同一名称,在不同地点、不同年代,或者同一地点,名称不同、时代不同,由于政治权力主导方的改变,其性质也发生转变,换言之,改变了其政治属性。区分的具体界限和分水岭是年代,核心是谁执政。

例如,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在1950年以前,它是监狱。战犯管理所、集中营、监狱,名称不同,其性质上都是监狱,是专政工具,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关键是由谁专政和专谁的政,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事物的本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1950—1975),原为日本侵华时拘押、迫害抗日志士的监狱,之后由中国政府接收。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7月开始关押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的伪满洲国战犯和日本侵华战犯,也关押了国民党反动派战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关押于此(据《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由战犯管理所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根据其设立、性质、任务和存在年代,应认定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革命旧址、遗址名称、年代、地址的关联性和整体性

一处革命旧址、遗址的名称、年代、地址三者紧密相连,以时间、地址、人物、事件为基本内容的内在联系构成紧密、统一的整体。对其正确定名、确定年代及地址至关重要。其中任何一项的准确性、合理性、科学性都会影响到整体的科学性,如果某一项出问题乃至错误,都会导致该处文物是否可以确认为革命文物的问题,甚至影响到同类项旧址、遗址的认定。因此,一处革命旧址、遗址的名称、年代、地址三者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应作为革命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认定的原则之一。

上述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旧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的名称、年代、地址的论述,已清晰说明名称、年代、地址三者相互关联、科学确定的极端重

活化利用中共辽吉省委旧址

周宇

辽吉省委是东北解放战争中吉林省委境内的三大省委之一,以陶铸为书记的辽吉省委,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创立辽吉根据地,胜利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辽吉省委领导广大白城人民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一是彻底清剿在白城全区的匪患,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二是结合剿匪斗争,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进行反奸清算和分配敌伪土地等工作。1946年3月至1947年6月,瞻榆、开通、大赉、安广、乾安、洮北、洮南等县先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分得土地486.51万亩。1948年6月末,境内农民第一次实现耕者有其田。三是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使分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政治热情饱满,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支援了前线,巩固了后方。四是大力保护和发发展工商业,促进当地工商业发展,不仅改善了群众生活,而且为支援前线提供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五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组织从无到有,党员从少到多。六是创办文学期刊,繁荣戏剧音乐,成立文化团体,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七是积极施策,动员民众奋起抗疫,有效控制了1947年夏蔓延辽吉地区的鼠疫疫情。八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竭尽全力支援解放战争,白城地区作为辽北省兵源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和西满根据地物资的集散地,解放战争期间,全区共派出运送伤病员的担架4.5万付,出战力大车近6万台,出筑路、架桥、修壕民工约10万人次;筹粮3亿多斤,捐款5亿多元,做军鞋5万多双。还有不计其数的肉、蛋、柴草等物资,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物资基地,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明仁南街156号,曾为白城铁路工人文化宫,现存旧址由主楼和锅炉房组成,主楼为二层砖瓦结构,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现存建筑保存较好。2007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2016年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旧址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存在电路老化和人为加装现代办公设施设备等问题。

旧址产权属于沈阳铁路局。从2021年初,白城市委市政府领

导带领发改等相关部门,多次与沈阳铁路局沟通协调,洽谈磋商,最后以资产置换的方式,终于在2022年收回旧址使用权。

为深入挖掘这一红色资源,重现当年革命斗争场景,打造吉林西部重要的党史教育、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基地,白城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的修缮改造工作。

旧址恢复保护利用工作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持完成。旧址存在很多问题和安全隐患,经过深入研究考量,认为应对辽吉省委旧址进行全面修缮改造工作。按照市委要求,主要推进了五项前期工作:一是学习考察。组织党史专家和有关人员,到省内和城外8家旧址和纪念馆进行了考察学习,对辽吉省委旧址的修复和展陈工作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二是文物征集。先后两次面向社会开展辽吉省委的史料征集工作,发出了《关于征集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有关文献文物的公告》。目前共整理和征集历史图片、文物、捐赠物品及文献资料等近400件,为全面改陈做好了基础工作。三是撰写大纲。根据多年研究成果,结合征集史料文物,认真撰写了以“瀚海丰碑——解放战争中的辽吉省委”展陈大纲。四是专业设计。根据反复修订后的展陈大纲,聘请专业设计团队进行设计,形成展陈方案。五是专家审读。特聘了吉林省内两名对辽吉省委有深入研究的党史专家: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宜田,省党史学会会长、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信君,作为旧址恢复的特约顾问,为展陈把关。根据专家审读意见,完成了修改和布展工作。

2022年11月1日,白城市举行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揭牌仪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对中共辽吉省委旧址修缮、加固、复原等采取针对性有效措施并加以保护,进行开放展示,辟为纪念馆,大大超越了革命旧址的本身的价值,更具真实性、历史感和纪念性。在保护和利用建筑本体的同时,关注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通过实地参观和多方位游览,使观众体验、缅怀、追思,不仅是对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更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对弘扬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故宫神兽“活”起来——故宫首部音乐儿童剧的诞生

闫宏斌



音乐儿童剧《用端》是故宫博物院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理念,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优秀作品,2022年9月曾创造出“一票难求、首演开票即售罄”的卓越战绩。2023年春晚,应央视之邀,“行一万,夜行八千,通晓四方语言”,代表自信自强精神的故宫神兽用端,出现在创意节目《当“神兽”遇见神兽》中,节目引发观众热情留言:“上古神兽也能这么可爱”“这神兽出奇的萌萌哒”“越来越萌的中国风”……2023年元宵佳节,《用端》登台国家大剧院舞台,再次演绎故宫文物家族的神奇故事。作为《用端》总策划,我参与、见证了该剧从创排至诞生的全过程。

我于1983年进入故宫,自1998年起从事展览宣教方面的工作。2018年,我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教育方面的工作仍然是我的关注点。我们利用互联网科技开启进一步探索,发布了故宫在线教育等项目,通过远程方式为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机会。除此之外,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其他形式,能直击心灵、产生更广泛深远的宣传效果,让小孩子也能对文物发生兴趣,譬如舞台剧。

后来因为一个契机,我有机会与艺瑞奇国际文化(北京)有限公司的钟碧珍老师和薛森予导演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并很快一拍即合。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筹划编创一部适合亲子家庭共赏的儿童剧,以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现代视觉技术,营造美轮美奂的舞台艺术效果,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将文物背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播撒在儿童心中,引发观众心理共鸣,实现“以文化人”和“以美育人”。

音乐儿童剧采用音乐、歌舞等艺术表达方式。角色是作品的灵魂,是故事的符号化呈现。为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精准定位受众群体,我们将目标受众锁定在6至12岁的儿童及其家长。为了符合这个阶段儿童的情感、心理状态和对事物的理解、思考方式,形象塑造既要贴合文物特征,更要拟人化、趣味化、艺术化。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余件(套)藏品,件件堪称国宝,但哪些文物

最为契合?专家们集体犯了“选择困难症”。几经琢磨,我提议将寿康宫庭院原状陈列中明万历掐丝珐琅香薰用端用作主角。首先,儿童与动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用端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据说能够日行一万,夜行八千,通晓四方语言,只为贤明君主传书护驾,因此又有国泰民安、生活富裕等美好寓意;其次,故宫600年的历史,这款用端就亲历了其中400年,这样的“老资历”是故宫文物的典型代表。经过文物专家和主创团队的多轮研讨,我们又从故宫浩如烟海的文物中精心遴选出用端的“小伙伴们”,但文物原型不能直接用作角色形象,必须在深挖文物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再通过提炼和创造性的艺术处理才能完成转换,每个角色的人设、形象特质、历史信息和舞台表现都力求与用端融为一体。精益求精之下,博学睿智的主角“用端”、蕙质兰心的“梅大姐”(原型为南宋沈子蕃缙丝《梅鹤图》)、威风凛凛的“永固杯”(原型为清金匱永固杯),还有书生意气的“平复帖”(原型为晋代文学家书法家陆机草隶书法《平复帖》),一个个在舞台上“活”起来。为了抓住儿童的兴趣点,我们还引入了故宫猫的角色形象,与孩子们产生更加直接的互动与沟通。

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才能推动故事的演进,才能吸引观众。《用端》的叙事结构,围绕数字时代文物创新传承方式的观念冲突展开,这也是我作为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一直以来的思考。围绕观念冲突和沟通化解,故宫宫廷历史部老高与孙子高小端、用端和他的文物家族成员,以及高小端与用端之间,演绎了一系列有趣又感人的故事。映射现实问题和场景,精彩又“接地气”的剧情,更容易引起现场小观众和家长的共鸣。其实,剧中那个热爱故宫、以故宫为家的“老高”,是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写照。

《用端》是故宫博物院在利用数字化创新文物价值阐释和传播利用方面的又一次探索。如何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中表现出故宫恢宏壮阔的建筑,呈现故宫600年、北京城上千年的历史?舞台柱梁交错构成的建筑结构与空间营造,视觉技术与沉

浸式舞美影像、裸眼3D等一系列前沿多媒体数字技术,帮助我们塑造了科技感与古典风格融合的意境与氛围,延展了舞台的表现力,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走入故宫殿堂之下,使故宫承载的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形象“穿越”到现代,走进孩子和家长心中。科技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呈现方式和新的内涵。

《用端》虽是一部音乐儿童剧,但我们从观感到心理都做了丰富的层次设计,看似轻松的故事内容,包裹了严肃的主题,既有知识性,又包含美育、情感教育乃至对人生价值的独特阐释,极大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一只刚刚体验过5次日落、一生仅有15天绚丽生命的小蝴蝶,搭配童声吟唱《与时间赛跑》,揭示了时间、生命、过去和未来的宏大主题,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间接受了一次关于时间和生命的教育。

文艺作品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对下一代的最大负责。在尊重史实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成为参与这部剧的文物专家和主创团队的共识。剧中每个数字、每句台词、每段历史都经过我们按最严谨的标准审核把关。我们希望这部集趣味、教育传播和文化传承功能于一身的儿童音乐剧,能唤起孩子们的求知欲,培养和提升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能够帮助他们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瑰宝的养分,融会贯通,传承下去。这正是贯穿全剧的“子孙孙永宝用”的台词主旨。

《用端》自2022年9月首演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积极的评价。当台上一只御猫问“用端去哪儿了?”全场小朋友都在一致告诉他“寿康宫!”时,演出现场互动的气氛相当热烈。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对儿童来说可谓超长了,但中途无人退场,甚至散场时我们还发现有3至4岁的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也来看《用端》。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关于《用端》的第一步探索我们走对了。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汇聚社会各界力量,继续对该剧进行打磨,深入挖掘故宫文物的文化内涵,更好地讲述故宫故事、中国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播入孩子们内心深处。